

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反思及路徑探析

崔月琴

[提要] 關於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認識和理解，不能只限於期刊本身內容和形式上的意義，而應站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和學術發展的視角來認識其意義。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來說，國際化並非只是單向度的輸出，去迎合西方的話語，而是要以中國的學術優勢和學科特色獲得話語權。這裡涉及國家利益、學術自主、學刊機制等相關問題。從中國學術和學術期刊的現實出發，國際化仍然面臨辦刊體制、學術評價機制、編輯管理等多方面的難題，上述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既要探索學術管理機制和辦刊機制的改革與創新，也要努力尋求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在辦刊方式和方法上的應用。國家要在文化的總體戰略中進行規劃、佈局，支持一批強勢期刊繼續做大做強，在國際上實行趕超戰略。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國際化 本土化 國家文化戰略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4 - 0104 - 10

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話題，在中國大陸被提起和關注並非今日，從改革開放之初到加入WTO，中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面一直面臨國際化的挑戰和機遇。今天又時值中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契機，從國家文化發展的戰略高度來重新思考這一話題時，我們不能不站在時代發展變遷的新節點上進行更深層的探索，充分認識其複雜性，豐富其內容。本文試圖從對學術期刊國際化涵義的理解入手，從國家文化戰略、辦刊機制改革、辦刊模式創新、網絡新技術的運用等視角來理解和探索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意義、難題和路徑，以求教於方家。

一、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理解及其意義

學術期刊，顧名思義是以學術為本、以刊發學術研究成果為己任的出版物。學術期刊以其學術性、專業性、連續性的特點傳播知識和信息，成為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重要工具。在現代學術體制下，學術期刊也是知識生產和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承載著對文化知識生產的加工、成型、推介的重要功能。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學術和學術期刊作為知識和知識的載體成為倍受關注的對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主席古德曼德·赫恩斯（Gudmund Hernes）教授2009年在應邀參加復旦大學的學術會議上指出，“一個國家融入全球社會，需要具有充足的知識

生產能力，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對象，具備國際合作的能力。而作為知識載體的期刊的意義就在於它對知識的傳播和推介，而學術期刊進入國際學術視野，則要注意學術道德、學術規範和知識類型等方面。”^①

1. 關於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認識和實踐

學術期刊國際化，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以學術期刊跨國出版為標誌的發展潮流。學術期刊的跨國出版以及在國際間的交流，意味著以學術期刊為媒介的學術交流正在成為世界各國展示科技、文化、藝術的重要平臺。

改革開放以後，伴隨國際化的潮流，大陸學術界關於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也有了許多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有人以“學術期刊國際化”做主題詞進行了檢索，幾個重要資料庫的相關論文均達上百篇，並以科技期刊國際化的探討居多，近幾年才出現了有關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國際化的論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內對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理論探討和實踐遠遠早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②在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研究中，主要圍繞以下問題：一是關於學術期刊國際化內涵的討論和分析；二是關於國內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狀況的研究；三是關於實現學術期刊國際化路徑的探討。上述研究為我們認識和理解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內涵以很大的啟示。歸納這些研究的主要觀點和近些年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運行和實踐，主要有以下幾種思路：

(1) 學術期刊在出版語言上與國際主流語言英語接軌，並以達到進入國際檢索系統為根本目標的國際化。這一思路主要是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嘗試學術期刊國際化發展初期的主導觀點並延續至今。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許多科技類學術期刊就率先進行國際化的嘗試和探索，並以爭取進入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的SCI檢索期刊為目標。國內學界和管理部門在學術評價上也以在國際主要檢索機構收錄的期刊發文為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標誌，這助推了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這一取向。國內學者聶珍釗等指出：“中國期刊的國際化，同美國三大科學引文索引有著直接關聯。科學引文索引能夠從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上，揭示科學文獻之間的內在聯繫。通過引文的統計與分析，可以從一個重要側面揭示學科研究與發展的基本走向，評價科學研究質量，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發展與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③受此影響，國內學術期刊紛紛按國際檢索機構的要求和標準，在中文期刊中加入大量英文元素，如增加英文摘要關鍵詞等，有的積極創辦英文版或英文期刊，並以此為目標進行國際化的努力和嘗試。截止“2003年，國際權威的SCI（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我國期刊有76種，比1998年增加了31種。”^④

(2) 學術期刊在編輯出版的各個環節上實現與國際慣例要求相一致的標準化、規範化和現代化，在出版形式和辦刊機制上與國際接軌。許多學刊建立了由國內外知名學者組成的編委會，增加國際編委的比例；實行國際通行的專家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實行國際通行的編輯標準；遵從和採用國際通行的摘要、引用注釋格式，等等。在辦刊機制上爭取與國際通行的學術規範接軌。

(3) 學術期刊加入國際出版機構以在國外出版發行的方式來實現國際化。這主要是以國內創辦的英文期刊的出版發行方式進行。如“《中國與世界經濟》（*China and World Economy*）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某研究所主辦的英文學術期刊，這家期刊2005年開始與外國出版商合作，2006年被SSCI收錄。研究所負責期刊內容，並在國內出版，外國出版商負責刊物在國外的出版發行以及刊物電子版的出版發行。Frontiers系列期刊由高教出版社主辦，該系列期刊多創辦於2006~2007年間。高教出版社與專業學院合作編輯刊物內容，並以專業學院為主，外國出版商具體負責刊物在國外的出版、發行。”^⑤

(4) 學術期刊以爭取國外學者稿源，擴大國際影響力的實踐。這是許多學術期刊近幾年努力的方向，有的期刊專門設立了“海外來稿”專欄，有的是以學術專欄的形式，邀請國內外學者參與，有的學刊專門邀請國外知名學者做欄目主持，這些期刊通過各種管道在世界範圍吸納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爭取和擴大國外學者稿源，以此來擴大國際影響。

綜合以上對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認識和實踐，我們可以看出，對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認識和理解，往往是以期刊自身編輯出版的形式化要求為主導，多偏重形式上的接軌。這在國際化進程的初期是十分必要的，有了形式上的規範和標準，才會促進內容的提升。但當我們擴展視野，站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及我國本土文化的發展和建構的視角來審視以往的認識和思路時，就不能不思考中國學術和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在國際化過程中國家利益何在？如何保護和展示我們特有的學術風格和優勢？

2. 從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和本土化視角的反思

在以往對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思考中，人們多關注從期刊個體的角度來談如何走向國際，如何增強國際影響力。而當我們以全球化的視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審視中國學術及其學術期刊的國際化走向和發展時，就不能僅僅將其視為期刊的一種趨勢，一種標準，而是要上升為旨在使中國文化、中國經驗、中國話語在國際社會中形成廣泛影響的國家戰略。

從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視角來看，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後，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了增強，其國際地位有了較大的提高。國際社會在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同樣關注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具有幾千年文化歷史的中國，同樣要以其強大的文化優勢在國際社會中贏得話語權，形成獨特的文化優勢和強勁的文化影響力。2011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有關提升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決議。會議提出：培育文化產業，擴大國際影響力，構建“文化強國”的國家戰略。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國家就制訂了中國學術、文化“走出去”的戰略。2005年，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張伯海先生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訪談時指出：“從文化發展上看，沒有廣泛的文化交往，不會有人類文化的進步；在文化交往中只接納別人的文化，而不善於張揚和有力地傳播自己的文化，這是一個民族文化式微甚至文化個性泯滅的表現。”^⑥中華文化如何張揚個性，中華學術的精華如何在國際舞臺上展示，這已成為中國新時期文化發展的重要戰略。

在整個中國文化事業中，學術期刊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是中國科技、學術、文化產品的重要載體，是國家實施文化強國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學術期刊在傳播學術思想、引導學術規範、培育學術人才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國際化的學術舞臺上我們的影響力還很小、很弱。中國文化的軟實力亟待增強。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先生慨歎：“一個國家有沒有好的科學體系、這種科學體系是否健全，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有沒有高水平的科學期刊。一個世界級的科學大國，會有世界級的科學期刊。”^⑦建設世界級的學術期刊是中國幾代學者和學術共同體的努力方向，也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目標。

從文化強國的視角來看，“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應該是政府倡導和學術共同體追求的學術國際化的目標，應該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事實卻並非如此。在學術和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進程中，出現了國內學者競相標榜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學術期刊以進入西方大國的

主要檢索機構為目標，導致我國大量優質稿源流向國外學術期刊，也促使學術機構和大學紛紛創辦英文學術期刊，以達到進入國際檢索機構為目標的國際化。“由此帶來的是中國學術期刊中的自然科學類期刊謀求被SCI、EI等檢索系統檢索，社會科學類期刊謀求被SSCI、AHCI等檢索系統檢索，這種轟轟烈烈的‘檢索’運動已經、正在或將要損害中國國家利益。”^⑧

眾所周知，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平臺上，西方國家一直佔有話語的主動權。借用依附理論的分析框架，我們會發現：作為現代化的先行者，歐美世界自然居於“中心位置”，而作為後來者，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只能扮演“邊緣角色”，形成了以歐美為主導的強勢話語優勢。在這一意義上，所謂國際化實際上也成為了西方化。在這種單向度的國際化中，中國期刊面臨兩難境地。援引以下文字作為例證：

“以《中國科學》、《科學通報》這兩家當年響噹噹的權威期刊為例，早在2005年3月，編輯這兩個刊物的中國科學雜誌社即與施普林格出版社簽署了合作出版協議。此舉標誌著代表中國自然科學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期刊——《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在通向國際化的道路上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在兩個月後的2005年5月，時任兩刊主編的周光召院士與10位正副主編卻聯合致信中國科學院領導：‘近年來，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產生了偏頗，片面強調影響因子的作用，對在國外發表的論文給予較高的認可度及高額獎勵，導致國內許多高水平論文外流。’如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不難看出最優秀的中國學術期刊在國際化的浪潮中竟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據說主編們的信得到了中科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採取了多種措施以挽救兩刊的頹勢。然而，幾年過去了，並未見明顯起色，兩刊竟然也鬧起了優質稿源荒。最近10年，受科技評價體系特別是片面追求影響因子的導向作用，和我國大多數科學期刊一樣，兩刊的發展陷入了低谷。”^⑨

上述事實表明了中國學術評價片面追求影響因子、學術期刊片面追隨國際檢索機構的後果。如果人文社科期刊也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學術的優勢、中國話語的自主性將無從談起。

學術和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並非只是單向運動。國際化有兩層含義：“其一，國際化表達了強烈的輸出願望，即要使中國的知識產品走向世界，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其二，國際化隱含了修改現行國際規則的可能，因為國際化背後還有著本土化的一面。”^⑩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本土的、特色的東西，雖然世界面臨全球化的趨向，但多樣化同樣不可避免。越是民族的、本土的才越是國際的。實際上，在國際交流的舞臺上，國際規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誰掌握話語權，誰就能以自己的規則部分乃至全部地替代已有的國際規則，故國際化不一定就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在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關係上，國際化並不意味著對本土化的否定，相反，應是各民族國家特色的張揚。但這並不意味人文社會科學拒絕國際化，而是一方面要以尊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術文化傳統，確保文化的多樣性不因國際化而消失，另一方面要以國際化的規範改造和調適本土化的缺失與不足，以形成彼此尊重、平等對話、開放合作、保護個性的國際化態勢。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化更富有挑戰性。

綜上所述，關於學術期刊國際化不只限於期刊本身內容和形式上的意義，其要旨乃在於將中國學術引向更廣範圍的學術平臺進行學術對話和交流，其價值和意義至少應從三個層面來認識：其一，學術期刊在辦刊規則和辦刊機制上朝向國際化標準和規範努力，可以從總體上提升學術期刊的規範化和科學化水平，搭建起中國與世界學術交流的平臺和基礎，推動中國學術研究和成果的國際化傳播。其二，學術和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平臺上的互動和交流，將極大地促進中國學術研究整體質量和水平的提升。學術交流要擁有過硬的學術產品，既要求其生產和加工過程的精緻

化，也要求其學術產品的個性化，只有那些突出學科優勢、研究問題的優勢，佔有資料的優勢，形成一定的優勢和特色的產品，才能在國際上獲得學術影響，爭得學術話語權。其三，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家的主導意識下，其投入和引領更將推進中國學術期刊做大做強，推進學術期刊的跨國出版和版權的輸出，增強中國學術思想的國際影響力。可以說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涉及國家利益、學術自主、學刊機制等相關問題，其價值和意義極其深遠。

二、學術期刊國際化面臨的難題

中國學術期刊體制是在建國之初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雖然中國經濟體制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文化事業單位的計劃管理體制剛剛或正在面臨變革。故大陸學術期刊界在邁向國際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辦刊體制、學術評價機制、編輯隊伍等方面的束縛。因為國際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在世界的平臺上自我審視、自我反思的過程，也是不斷改革創新、實現趕超的過程。

1. 辦刊體制的束縛

就辦刊體制來說，中國大陸由於受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影響，許多學術期刊是根據主辦單位的需求，經過行政管理機構的審批來創辦的。期刊的管理要接受行政主管部門和主辦部門的雙重領導，具有較高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學術期刊缺乏辦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這一特點最突出地表現在綜合性學術期刊上。中國大陸現在擁有6,000多種學術期刊，綜合性學術期刊佔據了半壁江山，並形成了千刊一面的狀態。這一中國所特有的學刊現象，與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所實行的單位體制相關，是單位制的產物。無論高校還是科研院所，創辦綜合性學術刊物的目的都是適應本單位科研、教學、教師的需要，成為各單位的“窗口”和“陣地”。這種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蔓延，形成了一校一刊、一院一刊的局面。這些學報、院刊一般來說是由主辦單位提供資金、人員、場所等辦刊條件，主辦單位的辦刊意圖和目的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的辦刊理念、辦刊模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以高校學報為例，由於學報的定位，形成辦刊模式的固化。從20世紀50年代創辦的第一批高校學報到80年代後一大批高校學報的創辦，其主導定位都是為本校教學、科研服務。1978年教育部《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中指出：“高等學校學報是以反映本校教學和科研成果為主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正是這樣的功能定位，眾多的高校學報長期都是以學科綜合的模式運行和發展。學校有什麼學科，在學報上都會有所反映，以涵蓋多學科門類為基本特徵。近十年來，伴隨學術發展及國際化的浪潮，高校學報全、散、小、弱的狀況遭到詬病。針對這一現象，學界和管理層也在積極推動高校學報的改革，但由於計劃經濟時代延續而來的高校學報體制已將其固化，雖然近些年各家學報實施各種改革，但綜合性辦刊模式尚難以改觀，專業性與綜合性學報比例嚴重失調，仍然是學報整體脫困的主要障礙。

學報的功能定位影響學報的自主性發展。面對國際化進程，學報的發展更是進退兩難。一方面要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開放辦刊，廣泛吸納國內外優質稿件，提升學術水平和影響；另一方面又限於單位主辦還要顧及本校的學科發展、科研佈局、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問題。如本校老師晉職與科研考核等需求、校內學科之間的發展和平衡、學校層面的各種關係和人情等等。特別是地方院校，學報為本校教學科研服務的功能更是不能縮減，甚至一些學校規定學報的內稿要佔較高的比

例，還有的學校無原則地提升本校學報的學術評價地位，以滿足教師評職的需求。正是由於高校學報這一行政化管理的取向和歷史上形成的功能定位，使其學術期刊的學術自主性大打折扣，學刊質量難以保證的根源所在。

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改革及辦刊模式的轉換，是一個涉及學術和學刊體制改革的系統工程。當我們以國際化的視野來審視時，更迫切地感到這種體制不但束縛了學術期刊的多樣化發展，更主要的是導致了學術標準和學術質量的低下。可以說，辦刊體制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學術和學術期刊只有獲得其發展的自主性，才能拓展其發展的向上空間。

2. 學術評價的影響

關於學術期刊、學術評價制度以及隨之帶來的學術風氣等問題，是近些年學術界熱議的話題。每談及學術風氣必然涉及學術評價，也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及學術期刊，因為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許多割不斷的聯繫。它們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當前的學術狀況和學術生態。學術風氣是學術健康發展的環境基礎，學術評價是引導學術發展方向的制度基礎，學術期刊是學術研究的展示平臺。前面兩個基礎出現問題都會在學術平臺上體現出來。目前大陸學術界片面追求量化指標的學術評價機制，導致了愈演愈烈的學風問題，同時導致學術期刊學術水平和學術質量難以維持，這已成為中國學術、學術期刊走向世界最為嚴重的障礙。

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和學術制度的變遷，學術評價越來越引人注目，成為學術制度中的重要環節。在近些年高校的學術評價體系中，一方面主導著以數量取代質量的評價體系與標準，片面追求量化指標；另一方面以學術期刊的單位級別劃定等級，以在核心期刊或等級高的學術期刊發文作為評價標準。具體表現在：

一是職稱評定。在教師和研究人員的職稱評定中，以科研成果的數量作為入門線，這在當前大陸高校以及研究機構中是一種通行的做法。^⑩論文篇數、專著本數成為職稱評定中量的指標，同時以論文在何種等級期刊上發表作為質的標準，由此導致的後果就是學術研究最核心的創新性價值不被重視，論文水平的高低不是由同行專家來評判，而是交給了期刊的編輯，從而造成以量取勝、以在學校認定的高等級期刊上發表文章成為高校教師的科研目標。

二是學校評估。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先後湧現出一批非政府的評估機構，對國內現有的高校進行排名，公佈“大學排行榜”，其評估的依據幾乎都是以數量為主。從某種程度上說，大學排行榜將大學對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推向了極端。因此，為追求在排行榜上名次靠前，創設各種機制來鞭策教師和研究人員多發論文、增添數量，就成為各所高校、特別是一些急於發展的高校的一種普遍行為。^⑪

“雖然在鼓勵多出學術成果、防止評價的主觀性和便於學術管理等方面，量化評價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積極意義，但是其自身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它與學術的內在邏輯本質具有相當程度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⑫這種以追求排行榜和以數量為依據的各種學術評價，導致了大量的學風問題。一是導致了急功近利的學術研究之風。二是導致了學術行為不端和學術造假，以剽竊、抄襲、數據造假、粗製濫造、不實署名、重複發表等垃圾學術成果大量湧現。三是導致了學者與編者關係的錯位。本應是編輯為學者服務，編輯追逐學者，但大陸一些名牌期刊的編輯成為許多學者追逐的對象。所以有學者稱：“這些年學術不端事件增多，不重視學術規範建設只是其很次要的原因。”那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幾點：其一，社會風氣影響。今天的學術界與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社會風氣必然影響到學界……其二，學術管理部門的‘學術

評價過度症’和近乎完全‘行政化’的學術管理機制，導致高校越來越像行政機關。其三，學者自身學術操守乃至做人操守在社會環境影響和‘學術評價過度症’的逼迫之下不斷丟失。”^⑩可以說，過度的學術評價和單一的量化標準破壞了學術生態，使一些學者的學術追求偏離了方向，學術論文的寫作成為了急功近利獲取功利的手段，失去了學術目標的價值追求。學術期刊要面對大量異化的學術產品，承載了難以承受的重負。因此，構建一個多元的學術評價體系，營造寬鬆的學術環境，對於提升中國學術論文的質量、形成嚴謹的學風是十分重要的。

3. 編輯隊伍的制約

在中國大陸，儘管形成了職業編輯隊伍，但編研分離的狀況使編輯素質難以提升。在學術期刊的編輯隊伍中專職居多，特別是綜合類學術期刊擁有大量的專職編輯，形成了一支龐大的編輯隊伍。這在海外及港台地區是不多見的。在海外多是專家學者兼職編輯工作。但在中國大陸，學者和編輯有著明顯的劃界，雙方很難跨越。這種情況近年來雖然有所改善，但在高校中還是涇渭分明。在學校的機構分類中，學報編輯部往往被定位於教輔類，在學校科研中只是處於從屬的位置。這種體制下，編輯的學者化目標難以實現，而且向上動力不足，造就了大量的編輯工匠。雖然教育部在2002年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中提出：“學報編輯人員是學校教學科研隊伍的一部分，應列入教學科研編制，享受與教學科研人員同等的待遇。”但在各高校中落到實處的還只是少數。編輯隊伍的管理和定位，是培養優秀編輯的前提和基礎，缺乏政策上的引導和制度上的保障，很難改變這支隊伍的現狀。從期刊國際化的角度來看，現代學刊的編輯不但要有專業基礎，至少還要有一門外語基礎，還應懂得國際出版規則，能夠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與國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但國內大量的專職編輯中具備這些能力者寥寥無幾。

“一流的期刊需要配備一流的編輯。優秀編輯的成長和培育需要制度和環境的營造。按照教育部的設想，高校學報要形成專家與編輯互動的結構，提倡編輯到院系所兼職做教學和科研工作，同時選聘知名學者到編輯部兼職，參與選題策劃和做欄目主持人。通過學者和編輯的雙向兼職，建立一支政治強，業務精，守紀律，作風正，懂經營，專兼結合精幹高效的編輯隊伍。這無疑是一條打造優秀編輯的途徑。但在各高校、院所的制度安排上還有一些障礙需要破除。”^⑪故培養一批適應國際化、網絡化、專業化發展的新型編輯人才，也是面對國際化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反思中國學術和學術期刊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有助於我們理清思路，找準問題，深刻認識國際化道路中的崎嶇性和艱難性，同時把握機遇，探索路徑，尋求發展。

三、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路徑探析

關於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國際化路徑的探索，在海外及大陸學刊界已經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在此僅就人文社會科學類和綜合類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探索做進一步的梳理和討論。

1. 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集刊”現象及國際化的趨向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在於它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和民族性。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其現代社會科學的勃興，究其實質都是圍繞著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而產生的，其學科的研究和發展離不開本國本民族的特點及特定的歷史研究狀況。因此，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國際化絕非單向度的輸出，而是要有選擇地引入、有計劃地輸出，在彼此交流對話中推進國際化的步履。學術期刊要根據學科定位、內容定位來確定國際化的方向。既要立足本土，堅持我

們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特色，同時還要面向世界，通過學術交流建立起溝通對話的平臺。近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學術集刊”現象，可以說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呈現的國際化態勢。它是學術共同體破解體制束縛，彰顯學術自主性的有益嘗試。

在國內高校中，一批擁有較強科研實力且在國內知名的學術機構，根據學術發展和學術需求創辦了具有一定學科優勢和特色的專業期刊。由於受到刊號審批難的限制，形成了一批以期刊形式連續出版，由出版社提供書號，形成“以書代刊”的模式，並被稱為“學術集刊”現象。它們具有如下的優勢和特點：

一是學者自主辦刊。集刊是由學術機構或學術共同體根據自身的學術優勢和特色及學術交流的需求而創辦的，並由本專業的專家和學者擔任主編和編輯。

二是專業方向明確，作者和讀者邊界清晰。這些集刊多是定位在某一級學科或二級學科，專業化程度較高，有明晰的學術領域和辦刊定位。

三是辦刊模式上與國際同行的專業期刊更切近，其國際化程度較高。有的集刊通過主辦或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和各種專業管道，建立起國內外的學術聯繫，容易彙集國內外優質稿件。

“學術集刊”的這些優勢和特點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已彰顯出來，並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有的“學術集刊”已與國際學術出版機構聯姻在國外出版英文版；有的委託國際出版公司代理在國外的出版事宜。這類學術期刊雖然在大陸還未獲得正式的期刊出版許可，但可能領先在國際上獲得一席之地。有些“學術集刊”由於定位清晰，起點高，學刊的影響因子提升較快，已被國內重要學術期刊的檢索機構收錄。

“學術集刊”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增強。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只有立足於學術研究的導向，才能構建起學科對話的平臺。

2. 綜合類學術期刊運用互聯網的新技術走向國際化的探索

相比而言，綜合類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有著很多的難題。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基本是以專業和問題為導向，綜合刊由於它的學科邊界不清、問題不夠集中等特點而難以進入國際交流平臺。但在國際化的趨勢面前，許多綜合期刊也以國際化的視野開放辦刊，積極尋求國內外專家的優質稿件，有的嘗試通過創辦特色欄目，邀請國內外專家的稿源，來擴大欄目的影響；有的嘗試通過專題討論的方式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並相互推介相關研究論文，以此來擴大影響，增進交流。但是這些努力很難真正破解綜合性學術期刊向專業化發展而走向國際的難題。從2011年3月起，高校名刊17家學報進行了一種全新的嘗試，採取自主聯合的方式，與中國知網合作創辦“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網絡版，利用數字化出版方式來實現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專業化重組。17家綜合性期刊經重新編目組合，打破學校界限、集中名校優勢，創辦了10種專業網絡期刊。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學報》、《文學學報》、《哲學學報》、《歷史學報》、《政治學報》、《經濟學報》、《法學學報》、《社會學報》、《教育·心理學報》、《傳播學報》。這一新型的專業網絡期刊，突破了傳統紙質期刊一校一刊、各自為政的局面。這是近年來國內高校學報名刊自主聯合體正在探索的一條新的路徑。這種採用數字化、集約化、專業化的嘗試，也許為高校學報的國際化出版打開了方便之門。

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創辦，既是一種新的辦刊理念的實踐、多元主體辦刊模式的探索，也是學術期刊編輯與後期出版製作分離的有益嘗試。它既是對高校學報名刊工程建設的延續，也是綜合性學術期刊專業化、集約化、網絡化發展的路徑探索。“它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辦刊模式，在一

定意義上實現了三個突破：一是突破了高校之間的門戶壁壘，嘗試了學報間聯合辦刊的方式；二是突破了紙質專業期刊的單一模式，嘗試了專業網絡期刊的方式；三是突破了單一主體的辦刊模式，實現學術期刊共同體與企業合作的辦刊方式。探索了紙質期刊和網絡期刊，綜合期刊與專業期刊，編輯部與聯合體的三個統一的實現路徑，成為目前國內高校首次以自主聯合方式與國內主流網絡媒體合作創辦的系列專業期刊。它的創辦，其立足點是繼續做好紙本名刊綜合性學報的編輯出版工作。名刊綜合性學報與系列專業期刊相依共存，各展其長：在論文組合上，分別以綜合性和專業性見長；在出版載體上，分別以紙本和數字版為主；在出版時間上，完全同步或後者更早；在傳播途徑上，前者以保持紙本傳統為主，後者則主打更為迅捷的網絡管道。”^⑥該系列期刊的推出，得益於方興未艾的“雲出版”，它是數字化平臺的新理念、新技術、新服務，並將成為今後出版業最顯著的特徵。

“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是高校學報通過網絡化、數字化和集約化的方式實現了專業化的重組，它為創辦中英文專業刊爭取部分專刊在國際上發行奠定了基礎。它的更為深遠的意義在於實現了期刊編輯與出版發行的分離，使高校名刊學報形成了全系列整體傳播的全新模式，為打造數字化時代學術期刊品牌形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嘗試對於全國幾千家綜合性期刊來說無疑是一種示範效應。

2011年6月，在“全國第十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高層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率先提出要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網絡群的倡議，力圖通過建立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的網絡群，來凝聚社會科學的研究力量，發揮網絡的群體效應，形成集約化優勢，並通過集約化，達到規範化的目的。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經過多年的改革、探索和碰撞，正在嘗試通過網絡化、數字化技術和手段，來實現集約化、專業化的路徑，無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即將建立的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網絡群，還是教育部高報名刊學報自主聯合創辦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都將有助於改變綜合性學術期刊“全、散、小、弱”的局面，形成集約優勢，加大傳播力度，擴展國內外的學術影響。

3. 以國家力量整合推動的中國特色文化和學術的國際化進程

中國文化體制的創新、學術期刊的整合與提升，已成為當前國家文化事業改革的重要任務，在“走出去”的戰略中，國家同樣肩負著引領、規劃和助推學術期刊國際化發展的重要使命。

引領，就意味著引導方向，把握全域。方向上的引領對於學術和學術期刊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術必須“走出去”，但要辨清方向，明確目的。“走出去”只是手段，增強文化軟實力才是我們的目的。對於那些具有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學術研究，更要在國際化潮流中予以重視和扶持，避免為了國際化而丟失了本色的東西，這些具有本國、本民族、本地區特色的研究才能在國際化的學術交流中彰顯我們的優勢和特色。我們不能盲目地、一味地追求“走出去”，而不顧其效果，要及時糾正國際化中的偏頗，避免走入歧途。國際化不能等同於“西方化”，中國學術要在國際文化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國際間的交流和對話中爭得我們民族和國家的話語權。

所謂“規劃”，意味著學術共同體和國家管理部門要共同謀劃，扶持中堅。在“走出去”的戰略中，政府的規劃對中國期刊界的現狀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哪些期刊應率先走出去，哪些期刊應有所保留，都值得我們的思考。特別是人文社科類期刊，由於語言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我

們要制定和規劃國際化的方案，尋找新的突破口，搭建起國際交流和對話的平臺。支持一批強勢期刊繼續做大做強，在國際上實行趕超戰略。

近年來，國家已經啟動學術期刊的資助項目，對在國內較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還有資料顯示，經新聞出版總署及相關部門批准的中外期刊版權合作項目也已啟動，政府主管部門也在全力加強中國版權貿易。據報導，五年間我國版權輸出總量增長275%。^⑩以上事實已經說明了國家出版意識的自覺。

總之，在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道路上，我們不能隨波逐流，一哄而起，而要在國家文化的總體戰略中進行規劃、布局和實施。既要探索辦刊機制上的改革與創新，也要尋求新型技術在辦刊方式和方法上的應用，使我們的學術和學術交流能在國際學術平臺上獲得應有的位置。大陸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學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門的共同努力。

①鄭巧：《學者建議設立“中國研究與學術期刊全球論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7月16日。

②鄭瑞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理論與實踐探析》，北京：《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10年第3期。

③聶珍釗、石挺、杜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狀況分析》，南京：《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聶珍釗係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外國文學研究》主編，從2005年開始，《外國文學研究》成為中國大陸首家A & HCI源刊。

④轉引自武京閩：《提升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路徑》，福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⑤李文珍：《國際化道路怎麼走？》（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5月10日。

⑥計亞男：《如何讓中國期刊走出去——訪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張伯海》，北京：《光明日報》，2005年1月17日。

⑦《改革中的〈中國科學〉與〈科學通報〉願與中國科學一起成長》，北京：《科學時報》，2008年9月9日。

⑧趙文義、張積玉：《國家利益視域下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出版》，昆明：《思想戰線》，2011年第4期。

⑨⑩朱劍：《學術評價、學術期刊與學術國際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⑪⑫許紅珍：《學術創新和學術評價機制創新的探索與思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3期。

⑬朱劍：《學術風氣、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蘇州：《蘇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⑭余三定、袁玉立：《學術不端與學術規範、學術管理對談》，合肥：《學術界》，2010年第7期。

⑮崔月琴：《綜合類學術期刊辦刊模式的轉換及其制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10日。

⑯崔月琴：《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打破校域界限，突出專業優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2月22日。

⑰柳斌傑：《大力提升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國際競爭力》，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報》，2011年12月23日。

作者簡介：崔月琴，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主編、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春 130012

[責任編輯 劉澤生]